

“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必将通过打赢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再次被载入史册！”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为英雄的武汉和武汉人民深情点赞，鼓舞着冲锋在抗疫一线的武汉人民英勇奋斗、共克时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武汉辉煌的历史，孕育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作为首义之城，这里曾打响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第一枪，奏响了推翻延续200多年的清王朝和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胜利凯歌。

救亡图存寻大道

以宽阔的历史视野看，辛亥革命的风暴发端于武汉，不是偶然的风云剧变，而是近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和运动的必然结果。从1840年至1901年8月，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300多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

面对极端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企图在维护腐朽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前提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而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农民阶级先后发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虽然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但最后都归于失

英雄城市·英雄人民·英雄历史

□ 郑永红 吴 翔

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企图依靠手无实权的光绪皇帝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却不料仅百日维新即遭惨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改良派的道路。他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先后创建兴中会和同盟会，将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救亡图存的主要手段。同盟会精心策划，在广东和西南地区相继领导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但是都先后失败。特别是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仍未跳出兵败人亡的厄运，其中72人的遗骸被收葬于广州东郊。此时，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斗争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

“惶惶苦为”图大举

革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历史选择了两江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自春秋战国以来，武汉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到了清末，武汉经济繁荣，位居亚洲前列。近代

以来，武汉人民积极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不断开展各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革命党人屡战屡败陷入绝境的严峻形势下，英雄的武汉人民毅然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勇敢地肩负起振兴中华、创建民国的千钧重担。

1904年以来，武昌相继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这些团体名称不同，宗旨一贯，为文学社之前身。他们之中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到了1911年，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湖北革命党人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团体。

武汉革命团体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既“不竞声华，埋头苦干”，又敢为人先，坚韧不拔。他们在新军中秘密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发展武装力量，积极准备起义。武昌首义领导者之一刘复基烈士本是一位文弱书生，为了组织革命武装力量，他毅然从军，锤炼自己。他说：“吾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汤镬且不惧，惶惶苦为。”入伍以后，他积极发展进步士兵，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至1911年5月时，新军中加入文学社的达3000多人，加上参加共进会的总计5000多人。

1911年9月23日，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

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第二天，召集各部队代表100多人举行会议，组建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 and 联络方式。起义时间定为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起义前夕，革命党人面临重重危机。1911年10月8日晚，蒋翊武被捕，后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跑。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不幸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武昌全城戒严，清军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革命党人英勇就义。此时，孙中山先生尚在海外，蒋翊武、孙武等主要领导人又不在现场，形势万分危急。是立刻揭竿而起，还是取消起义？武汉革命党人作出了正确的抉择。1911年10月10日晚，工程第8营的起义部队在武昌城头打响了第一枪，革命风暴骤然兴起。部队间虽情报隔绝，遇到许多未曾预料的危险，但起义官兵勠力同心、和衷共济，终于在天亮前

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整个武昌城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911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称：“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武汉遂被称为“首义之城”。

众志成城担大任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英雄的武汉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胜利。武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雄厚力量支撑。

武昌首义的当天下午，当第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张贴于武汉街头时，“到处挤满了观众，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武昌街头巷尾，可谓万头攒动，群情兴奋，许多人流下热泪，感到扬眉吐气”。武昌城内广大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各中小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生纷纷“停课闹革命”。一支约1300人的“湖北学生军”在很短时间内组建，成员多为武昌的初级师范、中学和高小的学生。学生军奉军政府之命，负责守卫咨议局、都督府及藩署、铜元局、

群众路线：延安时期卫生防疫工作的法宝

□ 冯建玫

延安时期，卫生防疫工作面临极大困难：一方面要面对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和医疗资源的极端匮乏；另一方面，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有100多万文盲，2000多个巫神，群众普遍存在迷信、愚昧、不讲卫生的习惯。如何才能有效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减少疫病的滋生和蔓延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能否做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工作，就成为决定卫生防疫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

教育群众 成风化俗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把卫生防疫工作纳入政权建设的轨道，从组织建设、政策法规、制度完善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推动，重点是改变群众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边区一方面持之以恒开展经常性的群众卫生运动，通过报纸、小册子、办展览会等多种方式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另一方面，卫生防疫主管部门经常组派大量专业人员深入基层，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面对面的卫生防疫宣传教育，以起到成风化俗的作用。

医疗队员们走村串户，不仅积极救治病患，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既了解了造成疫病流行的各种原因，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们进行的宣传教育便具有了特殊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延安一年四季都有胃肠道传染病流行，人员死亡的事常发生。经医疗队员们调查发现，发病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饮水不洁，水源周围多污秽不堪，且民众有直接饮用生水习惯；二是厨房不卫生，存在距离厕所近、蚊蝇多、灶具不干净等问题，做饭时也有不良的卫生习惯。找到病源之后，防疫工作者制定了相应措施，帮助群众解决全市范围内的饮水、厨房卫生问题，要求饮用烧开之后的水，采取措施安排妇女将烧开的水送到田间地头供劳动者饮用，逐步养成喝开水的习惯。

各地医疗队在帮助群众解决病痛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封建迷信给大家带来的巨大伤害。据《解放日报》记载，延安曾有巫神161人，每年每人跳神“看病”多达36次，且费用极高，请他们“看病”的百姓往往落个人财两空的结果。各地医疗队组织了

各种各样的巫神坦白大会，揭露他们跳神过程中的骗人伎俩，更用科学的诊疗结果教育群众，从根本上破除群众的恐惧和疑惑。延安子长县一对母子患麻疹并发肺炎，孩子疹子发不出来，昏睡不醒，已经被请来的巫神宣布“不可救了”。医疗队派了两位医务人员登门救治，精心护理，终于使孩子脱离危险并在不久后痊愈。这样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件，极大地教育了群众，对于边区民众提升思想认知，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组织群众 分区防疫

为推进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边区于1940年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负责延安境内的卫生防疫工作，还在各大机关单位、区乡各级根据需要成立分会，具体负责各单位、各区乡的卫生防疫工作。这样的组织体制，有效推动了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在疫情暴发期间还能更好地组织群众，真正做到分区防疫，有效隔离。

1942年3月，河曲、绥远、宁夏等地发生鼠疫，为避免疫情传入边区，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地址设在中央医院，直接领导延安40华里范围内的防疫工作。下设东、南、北、西北四个防疫区，涵盖了市内所有乡镇，各区设防疫分区委员会，分别由留守兵团卫生部、边区卫生处、八路军总卫生处和中央总卫生处负责，责任明确，各司其职，使防疫区域不留死角，防疫措施落到基层、落到实处。为加强防疫督导，由延安市公安局各分驻所和各乡镇政府担任检查、督促、纠察的任务，在防疫一线保证各项防疫举措得以执行。在疫情已经发生的区域，这样的组织机制反应迅速，可以第一时间派出救灾工作组，进行防治疫情的宣传、组织工作，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将病患和无病者分开。对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则暂时断绝其与其他村庄的往来，以达到防治疫情蔓延的效果。在延安时期特殊的战争环境下，高效的组织体制，高度负责的医务人员，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组织发动基层群众，群防群治，共同构成了防治疫情滋生和蔓延的有效屏障，打赢了一场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极大地降低了边区人民疾病的发生与死亡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防疫经验。

服务群众 救死扶伤

在各种资源都极度匮乏的延安时期，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是最为短缺的“资源”之一，他们数量不多却是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的主力军，在防治疫情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无疑是巨大的。1944年发布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对当时的医务人员提出了明确要求：重视自己神圣岗位，加强自己为群众工作鞠躬尽瘁的精神，以求边区大量疾病死亡现象能够减轻和消灭。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用更为简洁的语言总结了对包括医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要求：他们要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延安时期的医务工作者，遵循着这样的工作要求，服务群众，救死扶伤，成为走群众路线最为直接的实践者。

延安时期医务人员治病救人的“病房”，常常是坐落在每一个发生疫情的乡村农舍。1942年，延安附近几个乡发生了急性传染病，许多村民上吐下泻，死亡率相当高。延安防疫委员会派出几个防疫队，下乡执行调查、治疗和扑灭任务。曾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的徐根竹率领两位队员于4月前往疫情严重的川口三乡，该乡死亡人数高达48人。此病来势凶猛，患者往往一到三天就死了。老乡们烧过香、找过巫神，结果还是无法挽救，都感到十分恐惧，甚至已经开始有人开始搬家迁往别处。徐根竹和他的医疗队在发病的乡村住了两个多星期，经过耐心缜密的调查、走访和医疗救护，救活了15位严重病患中的11人，找到了疾病流行的源头——两条受污染的河流。防疫队帮助百姓制定了消灭病源的办法，监督百姓遵照实行，直到疫情扑灭才回到医院。返回的当天晚上，徐根竹向卫生部作了汇报，还画了一张很详细的疾病分布图，从饮食关系上对疫情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的总结对之后扑灭其他几个地方的疫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同年8月，延安开展群众卫生工作模范人物选举和表彰活动时，会场突然来了川口三乡的十几位老乡，提着鸡蛋等各种礼物要求选举一位姓徐的医生当模范，在主席台上讲述徐医生为大家看病的种种经过。在会场的徐根竹医生局促之中说了一句：“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这样的医生、这样的群众、这样的医患关系，是艰苦岁月里能够在一次次疫情中“少死很多人”最为重要的原因。

长征路上，有人问张闻天，怎么老是跟着毛泽东跑？张闻天回答：“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苟坝会议是检验真理在谁手里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一）

1935年3月10日，苟坝。这个位于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传统村落，静静地躺在从山峻岭之中。

自长征以来，刚刚取得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等几个难得胜利的中央红军，正士气大振，豪情满怀。当日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向朱德发来“万急”电报，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并拟制了一份具体的作战方案。

红一军团的电报缘何以“万急”等级发出，是因战机稍纵即逝。随即，张闻天召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20多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这是遵义会议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从一个极端走向的另一个极端，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包括火烧眉毛的打仗这档子事，也都要以这种极端民主的方式表决。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20多人七嘴八舌、枝蔓横生，争论不休，对打与不打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绝大多数人认为，在遵义战役大捷的鼓舞下，希望多打几个胜仗来创造云贵川三省地区的根据地。而毛泽东不这么想，认为眼下红军虽然稍稍恢复了点元气，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疲惫。况且，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真正打起来后各方援军就近机动，很容易形成两军对垒，红军则很快会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僵持不下。会议主持者见双方争执不下，便决定民主表决。结果，支持毛泽东意见的只有毛泽东本人一票。于是，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急了，试图作最后努力阻止命令的发出。

“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会上，有人毫不客气地将毛泽东顶了回去。会议开到最后，非但没有听进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还举手表决免去了毛泽东只当了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和与毛泽东意见不一的人当时是“道”而同“术”不同而已，“同”的都是出于多打胜仗的良好愿望，都是从党和红军根本利益的站位上出发的，“不同”的只是各自对事物认识的程度不同而选择的路径不一而已。在那个残酷斗争、风起云涌的环境里，他们没有个人的利益之争，也没有

“谁说了算”的想法。

（二）

会议开到了这个份上，毛泽东可以说是该尽的力都尽了，更何况官也丢了，可以无官一身轻了。还有，就在会议召开前20多天，夫人贺子珍在不远处的白沙村刚刚分娩，等待着与他分享天伦之乐。

是啊，如果从个人的私人或恩怨出发，毛泽东这样想、这样做也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如果真的这样，也就不是伟人毛泽东了。

散会以后，毛泽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的是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决不能让红军再受挫折；想到的是这仗一旦开打，稍微恢复了一些元气的红军必将遭受新的重创；还有，自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坎坷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已有5万多红军将士为“逃跑主义”埋了单。这5万多不仅仅是一串冰冷的数字，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赢得未来胜利的本钱啊。

毛泽东越想越多，夜不成寐。于是，他索性披上衣服，提着一盏马灯，沿着坎坷的水稻田埂路，去找周恩来商量，为制止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做法再作一次努力。

在那条只有两公里长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心急如焚、忧思忡忡，走得何其艰难。我们现在无法透过历史的暗夜去猜度毛泽东当时的思绪，但他一定会想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他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他尝够了不让他指挥军队、不让他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的味道。好不容易在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一个月前，在“鸡鸣三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而几个小时后又予取消了。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三）

当夜，毛泽东说服周恩来后，马上又请来朱德一起商议，朱德也表示赞同。到了凌晨4点的时候，中革军委二局截获了敌人电报，确认滇军和川军正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其周边已有敌人100个团。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一情报验证了毛泽东不打打鼓新场的理由，也验证了他高人一筹的战略思维。

次日，会议继续进行。会上，周恩来、朱德同与会者摆情况、讲形势，力陈利弊，张闻天等领导人也很快转变立场。如此一来，前一天通过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敌的作战计划被彻底否定。接着，会议又决定恢复

官钱局等要害机关，并维持武昌城内治安。据估计，上述府库中储备金银钱钞总值不下4000万银元，在学生军护卫下分文未少。后来起义军由一个协（相当于旅）扩充到八个协，战费开支全由此支出。在战事紧急之际，学生军还开赴前线作战，“内守外攻，均关重要”。

为赢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武汉人民浴血奋战，战死沙场的勇士达1万多名，绝大多数为无名烈士。仅40天的阳夏保卫战，就牺牲起义军民万人，留下姓名和小传的只有41个人，其余绝大部分都是草草合葬在汉口和汉阳的几个大堆里。

董必武作为亲历者，回顾了武昌起义的情景：“当时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的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员，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持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高度赞扬武汉民众表现出的英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武昌首义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开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熠熠生辉的里程碑。武汉人民在辛亥革命中涌现的敢为人先、勇担大任、万众一心、攻坚克难、不畏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斗争谱写了崭新篇章。武汉人民在斗争中凝聚的武昌首义精神，弥足珍贵，必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写在苟坝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

□ 顾伯冲

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形势翻了盘，毛泽东便因势利导，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战机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局势，指出决策指挥上的弊端。

战果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国民党之滇军孙渡部已经从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虎视眈眈，敌人以八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

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红军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第二天，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进入新三人团的毛泽东，就此真正执掌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后，与会者开始反思，并转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

苟坝会议不仅是毛泽东职务变化的一次飞跃，更是全党全军对毛泽东“认知认可”的一个飞跃。